

习仲勋来安阳

李 濮

习仲勋同志是1959年的5月26日来安阳市的，同来的有他的爱人和秘书，河南省陪同来的有副省长李庆伟同志和省委秘书长苗化铭同志。习仲勋在安阳期间，听取了中共安阳市委的工作汇报，由市委第一书记刘东升陪同参观了安阳钢铁公司、水冶炼铁厂和李珍铁矿，游览了袁世凯墓，登了文峰塔等。29日离开，临走以前和市委机关的全体干部合影留念。习仲勋同志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给市委机关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习仲勋同志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他来的前两天，中共河南省委就电话通知了安阳市委，第二天省委办公厅又派人送来了文字通知。习仲勋同志亲临安阳市视察和指导工作，对安阳市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因此，市委的领导同志极为高兴。但来了住在哪里呢？这是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当时安阳市还穷得很，可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没有一个象样的招待单位，虽说已建立了交际处（即现在的安阳宾馆），但只是刚刚筹备，人员很少，条件很差，不成个样子，还不能接待客人，更难于接待中央领导同志，于是便决定叫习仲勋住在安阳市委机关里边。当时市委机关住在安阳市北关灯塔路路北一个院内（即现在的市政府大院），把市委书记们的办公用房腾出来，连夜进行了打扫和布置，习仲勋及其客人来了就住在那里。在市委小灶上就餐（当时

市委机关有两个灶，一个是灶，一个是灶）。饭菜也很简单，没有高贵的美味佳肴，全是一些家常便饭，也没有从外边聘请高级厨师，饭菜完全由市委机关的伙夫同志承担。市委对这种简易招待过意不去，再三向习副总理表示歉意道：“安阳市很穷，条件很差，习副总理来到这里，住不好也吃不好。”习仲勋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种简易的招待不但不介意，反而很高兴，他说：“这样最好，我很喜欢和群众在一起，这样比住在宾馆里边强得多。”

当时市委机关只有两辆破旧汽车，还经常出毛病，既拿不出门去，也保证不了安全。为了安全起见，向原8300部队（即一师）借了两辆69吉普车，司机也是该部的。为了接待习仲勋同志的爱人，专门把市交际处的张秀芹同志借调到市委机关。其他一切跑前跑后的具体事情，全由市委机关的同志承担。

习仲勋来到的第二天，听取了市委的工作汇报。市委副书记刘传明和吕锡田负责汇报安阳钢铁公司的建设和生产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由于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汇报的非常详细，时间也用的比较长。市委副书记李绪三同志负责汇报安阳市的全面工作，而着重汇报了工业生产和市政建设情况，说的虽比较简单，但概括的很好，很条理。习仲勋同志听了汇报后，对安阳市的工作作了肯定，对群众的干劲和各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当时，安阳市在以钢为纲的思想指导下，片面夸大钢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在指导工业生产上不够清醒，不顾客观条件，建立了好几个钢铁厂，摊子铺的比较大，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同志说：“炼钢铁当然好，但摊子铺的不要太大了，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摊子大了管不过来，也会造成浪费，集中力量搞好安钢就行了。”他还针对大跃进中的

一些问题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向前发展的，撇开计划经济规律，盲目发展就会出问题。”灯不拨不明，思想不说不亮，经习仲勋同志这么一指示，市委领导同志的指导思想顿时清醒了许多，开始冷静地思考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对安阳市的钢铁生产着手进行调整。

习仲勋同志此次来安阳市的主要目的是具体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安阳钢铁公司的生产问题。经过河南全省人民的艰苦努力，安阳钢铁公司建起来了，并已开始进行生产，但缺少焦炭，如果焦炭上不去，很难正常持久地进行生产。六河沟的煤是有烟煤，可以炼焦炭。六河沟原属安阳县管辖区域，解放后因平原省缺少电，要求用河北省的电，河北省提出条件，用电可以，但六河沟煤矿得划给河北省。当时平原省的领导同志，还不可能预见到七八年以后，会在安阳市建立起一个中型钢铁公司的事儿，于是就答应了下来。从此以后，六河沟煤矿就给了河北省。也就是说，用六河沟煤矿换来了河北省的电。应该说，这项措施，对安阳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它的后遗症也是显而易见的。当历史发展到1959年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当河南省在安阳市建立了一个中型钢铁企业的时候，向河北省重新要回六河沟煤矿的问题就尖锐地提出来了。习仲勋专程来安阳市就是为了恰当地处理这个河南河北两省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当习仲勋听了安阳市的汇报，实地进行了考察并仔细研究了有关材料之后，为了支持安阳能够正常进行生产，为了支持河南工业的发展，他认为六河沟煤矿重新划给河南省是适宜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他说：“六河沟煤矿地区重新划给河南省可以，但问题不那么简单，必须同河北省商量，硬性决定不好。”经他和河

北省领导同志商量，河北省不同意，他说：“河北省不同意，这我就难办了。”习仲勋同志又出主意说：“现在总理正在石家庄市视察工作，你们可以带着有关材料，去向总理汇报一下，叫总理说说话，看看怎么样？”根据习仲勋同志的指示，市委副书记刘传明同志，携带有关材料，到石家庄向总理汇报，但总理未在而到其他地方去了。刘传明向总理的秘书进行了反映，秘书又向总理进行了转呈。总理办事一丝不苟，凡是应该解放的问题，去人不去人都是一个样，经总理亲自和河北省的领导同志商量，地面上仍为河北省的地盘，区划不作变更，但地下的煤河南省可以开采，照顾了河南的需要，就这样两全其美的解决了。现在河南省可以在河北省区域内采煤，其历史的原因就是这样形成的。

5月28日夜晩，市委请习仲勋同志看豫剧，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我很愿意看一下河南的地方戏，但一定要买票，不能看白戏。”河南省豫剧二团吴碧波正在人民戏院演出，就看了她的戏。当时剧场内有一个传统习惯，在座椅前边有一个长条形的桌子，约有一尺来宽，上边可以放些茶壶、茶碗、水果、瓜子之类的东西，观众可以一边喝茶吃瓜子，一边看戏，是一种很好地享受。剧场里的服务员，提一个大铁壶，不时给送开水。这种传统习惯，也不知起于何年何月，经历了多少年代，到了1959年的时候，还没有改变。由于剧场里的观众比较多，在送水的时候，提着一个大铁壶，磕磕碰碰的事儿时有发生，但人们因集中思想看戏，不管碰着了谁，一般都不大在意。这天晚上，当服务员提着铁壶送水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水洒到了李庆伟同志的腿上，李很不以为然，其实习仲勋同志对看戏时来回送水也很不习惯。

习仲勋同志离开安阳市以后，大约有一个来月的功夫，市委秘书长崔子云、办公室副主任成庆堂和市交际处主任陈道一一行三

人，前去北京找他。习仲勋当时住中南海。他们三人虽说见过世面，阅历丰富，但进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还是第一次，因而感到局促不安。身为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对下边没有一点架子，凡有人找他，他都热情接待。习仲勋在安阳时，和崔、成二人就认识了，此次是老朋友相会，但对陈道一尚不熟悉。崔子云指着陈道一向习副总理介绍说：“他是安阳市交际处主任陈道一同志。”习仲勋看他们三人精神有些局促，谈吐不够自然，操着浓重的关中口音指着陈打趣说：“你叫陈道一，就是说道路只有一条……”话音未落，他们三人都笑了，顿时紧张气氛消失了。崔、成、陈三人去时给习仲勋同志带了两条安阳卷烟厂生产的“昙花”牌香烟，但他不吸烟，还拿出来“大中华”招待他们三人。

崔、成、陈去北京的主要目的是：安阳市要建立宾馆，没有东西，想叫习副总理给些支持和援助。习仲勋听了他们的来意之后，把他们介绍到国务院机关管理局，管理局又介绍到国务院交际处。何光杰处长带领他们参观了北京饭店、香山饭店等几家较大的饭店，学习了人家搞接待工作的经验。还请他们三人在中南海礼堂观看了湖南花鼓戏的演出。在习副总理的关怀下，把他们三人安排在第四排的位置上。真巧，那天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差不多都去了，被他们都看到了，在他们的一生经历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事情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现在每当谈起来那天晚上看戏和看到国家领导人的情景，依然津津乐道，兴奋不已。习仲勋同志对安阳市建立接待单位极为关怀，并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次他批给了二十张席梦思床、五个立柜和一部美国吉普车。这些东西现在来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来说，却是相当可观的。对安阳宾馆的建设，打

下了基础。这部吉普车，虽说是朝鲜战场上的战利品，上边的帆布蓬已被烧掉，但机器完好无损，弄到安阳市成了最好的车了。

195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放烟火庆祝建国十周年。当习仲勋同志在北京饭店楼顶上看烟火的时候，一扭头看见了安阳市交际处的张秀芹同志（张秀芹是到北京饭店培训实习的），热情地询问了张到北京后的情况，并说：“小张同志，你到北京这么长时间了，为啥不到我家去？”张秀芹说：“习副总理，您工作很忙，我去会给您增加很多麻烦。”第二天，习仲勋同志把张秀芹接到他家里，并亲自给她削苹果。正在这时，来电话要习副总理接待外宾，习仲勋同志歉意地说：“小张同志，我有外事活动，不能陪你了。”并对他爱人和闺女说：“你们要招待好小张。”张秀芹作为安阳市交际处的一名普普通通的职工，做梦也不敢想，她能到国务院副总理家里作客，但这是事实。

马赛护送杨勇舒同过汤阴

尚庆恩

1944年4月的一天，内黄沙区办事处的交通科长马赛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立即到太行办事处去接受任务。马赛接到命令后心中直纳闷，自从他到沙区负责地下交通工作以来，一直都是在这边接受了任务，护送到那边去，从来还没有点着名要他到那边去接受任务的。究竟有何重要事情非要他去不可呢？然而，纳闷归纳闷，对于上级的命令，马赛同志向来不打任何折扣，总是无条件执行的。他把交通科的工作向其他同志简单交待了一下就出发了。经过一个昼夜的艰苦跋涉，于第二天晚上赶到了太行办事处。刚用完饭，太行办事处的一位负责同志就给他交待了任务：“有两位首长和他们的爱人要到冀鲁豫（根据地）去，需经过汤阴一带的敌占区，组织上考虑你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的经验丰富，又是汤阴人，情况熟，所以决定让你前来护送他们过去。”话毕，就把他领到二位首长的住处。二位首长热情地给他让坐打招呼。虽然未经介绍，但从二位首长的举止言谈上就可以看出，他们不是一般的领导干部。近一个时期以来，常有高级干部过路，马赛曾先后护送过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这次护送的二位究竟是谁呢？由于当时有保密规定，接受任务时，不让知道的事情不能乱问，马赛也就没有再打听。他只是向太行办事处的同志问道：“到路上怎么称呼呢？”太行办事处的同志回答说：“随你

的便，叫老李、老张都行。”马赛就又征求二位首长的意见：“打算何时动身？”二位首长说：“越快越好，就看你的了。”接着他又向太行办事处的同志询问了准备工作情况，太行办事处的同志回答：“一切都妥当了。”本来，马赛从接到命令到现在，一个昼夜的功夫就走了二三百里路，累的他浑身的骨架都快要散了，他是多么渴望能躺下来休息一下啊！但他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革命事业。他想，这二位首长都肩负着重任，不能因为自己劳累一些就影响了他们过路，应尽量争取时间。强烈的责任感使马赛同志的疲劳消失了。他对二位首长说：“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这样天亮前就可以赶到大河涧村。大河涧位于太行根据地的东沿，那里设有咱们的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天亮前赶到那里，白天休息，夜间继续赶路，这样我们过路的时间就可以提前一天。”二位首长听后相互交换了一下意见，说道：“那就这样决定吧，现在出发。”太行办事处的同志立即前去集中过路的其他同志和护送人员，不大一会儿就集中齐了。当马赛陪着二位首长从屋里出来时，院子里已经站了很多，还备有不少马匹。

马赛看到这种情景，心中倒有些犯了难，他想，这么一大队人马要通过敌占区谈何容易！这时，太行办事处的同志似乎也猜出了他的心事，就赶忙解释道：“这些同志和马匹只在咱们解放区送送首长，到了根据地的前沿就回来。”二位首长也风趣地对马赛说：“我们总共8个人，除我们2人外，还有两个女同志，4个警卫员。从现在起都是你的兵，一切行动听从你指挥，你不要有任何顾虑。”听了介绍，马赛同志的顾虑顿时消除，他笑着答道：“好，同志们上马，出发！”经过几个小时的夜行军，于黎明前到达了大河涧。马赛让抗日民主政府的同志把首长安顿下以后，就让太行办事处前来护送的人马返了回去。到这时，马赛同

志已整整一天两夜未合眼了。他实在支撑不住了，没顾得上吃饭，找了个地方倒头酣睡起来。他一觉睡到夜灯初上的时候才醒过来。首长派警卫员把他叫去，问他下一步怎么个走法。他告诉二位首长，前面要通过的地带是游击区，敌人在夜间一般不敢到这一带活动，在路上提防着些就行了。天亮前赶到耿寺村，然后根据情况再作决定。

他们吃过晚饭，带了些干粮就又上了路。一行9人，马赛与两个警卫员走在前边，二位首长和他们的爱人走在中间，还有两个警卫人员在后边。他们相互之间适当拉开一些距离，遇到特殊情况，前边的同志及时发信号，让后边的同志迅速隐蔽。他们一路急行，穿鹿楼，过故县，到达耿寺时天还未亮。这里已接近了敌占区，马赛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交通恐怕发生意外，不敢冒然行动。他让首长他们先在村边等候，独自一人前去敲地下联络站的门。这个联络站的负责人李廷柱听到联络暗号就赶忙开门把他迎了进去。马赛看到没有什么异常变化，才放下心来。他与李廷柱一起把首长接到联络站，为了确保安全，李廷柱同志向大家介绍了耿寺村的情况。他说：“这个村子离汤阴城不足20里，我们这门前不远就是通向汤阴的大路。村子的东南方是宜沟镇，那里也驻有不少日伪军，敌人的便衣特务经常到这一带骚扰，希望大家一般不要出去活动。”把首长一行安顿好后，马赛便与李廷柱商量起护送首长通过汤阴城的方案来。他首先让李廷柱介绍了一下近几天汤阴城内敌人的活动情况。李说：“近来，敌人的军车来往频繁，听说又从安阳开来了不少日本兵，但还未弄清楚他们是路过还是准备‘扫荡’。孙殿英的便衣特务白天一般不出来，却在夜里加紧活动。另外，还听说崔家桥土匪司令王自全的人也来汤阴了，不知道他们又来搞什么鬼名堂。”接

着，马赛又向李廷柱询问了驻守汤阴西关孙庄碉堡中伪军的情况。李回答：“那里住着一个排的伪军，他们只把守路口、检查过往行人，一般不大出来骚扰百姓。”等李廷柱详细介绍之后，马赛把敌情在脑海里作了通盘考虑。他想，目前汤阴汇集着各种反动势力，除了盘踞汤阴城的日军和汉奸孙殿英部外，驻安阳的日本宪兵特务，县东一带的各种地主、土匪武装的便衣人员也经常到这一带活动。各种反动势力犬牙交错，他们之间尔虞我诈，锅盖碰勺子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不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吗！再说，敌人总是认为共产党八路军只在夜间活动，所以他们就夜间加强了防范，对各交通要道路口把守的很紧。而白天相对来讲则比较松一些。看来在夜间通过比白天通过的困难要大的多。好，这次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白天通过汤阴城。如何个通过法呢？如果9个人一齐行动，目标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还是分批护送较为妥当。当马赛把自己的想法给李廷柱讲了之后，李先是反对，认为大白天通过危险性太大。马赛又将自己对敌情的分析讲述了一遍，李经过斟酌，也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但他建议在护送首长时身上要藏上短枪，发生意外情况时好对付敌人。马赛却认为，带着短枪护送不妥当。他说：“如果我们真的被敌人发现了，在孙殿英的司令部大门口，带上两支短枪也是无济于事的，那样反而向敌人暴露了我们的身份。如果不带枪，即便是遇到一些麻烦，还有周旋的余地，咱俩又都是汤阴人，有‘良民证’作掩护，还是能够应付过去的。”

马赛和李廷柱把护送方案商定之后，就向二位首长作了汇报，征求他们的意见。首长微笑着说：“还是那句老话，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当天夜里，马赛就把二位首长的随行人员转移到蚕姑咀村他的家中。蚕姑咀村距耿寺仅七八里路，来回只用了两

个多小时。第二天一早，马赛、李廷柱和二位首长都化了装。他们每人都头戴礼帽，身穿绸布大褂，戴着金丝茶色眼镜，骑着自行车，向汤阴县城驰去。从耿寺到汤阴，大都是下坡道，骑自行车走的很快。不到个把小时，就来到汤阴城西边的孙庄。这是进入汤阴城的第一道关卡，敌人在路口筑有一个大碉堡，过往行人都必须从碉堡下边通过。从敌人的碉堡中伸出的枪口，阴森森的直对着公路，路的两旁设有岗哨，他们4人来到碉堡下，走在前边的马赛用轻蔑的目光扫了一眼站岗的伪军哨兵，便挺直胸脯，用劲紧蹬了几下冲了过去。紧接着，二位首长和李廷柱也没有下车便顺利地通过了关卡。

为了少找麻烦，过了孙庄关卡，他们没有直接进城，而是向南绕了个弯才又向城南关走去。他们刚到南关街口，便被两个伪军盯上了。马赛一看形势不妙，得赶快想法子摆脱掉这两个家伙。于是，他故意拉大嗓门喊道：“老李，我的肚子已经饿的咕咕叫了，咱们是不是先吃点东西再走？”李廷柱立即答话：“我也饿了，咱们就吃些饭吧。”说着，他们就都下了车。马赛领着二位首长和李廷柱来到一家饭馆中。这家饭馆不大，临街是几间餐厅，餐厅里放着一些桌凳，餐厅前门通街，后门通院。饭馆的掌柜很热情，一见马赛他们进来就主动打招呼，让跑堂的伙计打来洗脸水，他们洗过脸后就在靠窗口的一张桌前坐了下来。饭馆的伙计又给他们送来了茶。这时才问他们要吃些什么。马赛说：“先炒几样菜，挑最好的做，吃啥饭等一会儿再说。”按说，他们还急着赶路，要些简单的饭菜随便吃些充充饥就行了。可是盯梢的那两个伪军又跟踪来了，当饭馆伙计问他吃什么饭时，那两个家伙已来到了饭馆门口。在这种场合，马赛是故意摆阔气给跟踪他们的伪军看的。两个伪军走进饭馆没敢直接找马赛他们的麻烦，

而是先到后院转了一圈，才又返回餐厅，两双贼眼不停地在马赛四人身上打量来打量去，企图找出什么破绽来。可是他们四人都神态自若，一个个安闲地品着茶。这两个家伙见无隙可乘，站了一会儿就出去了。但是他们到门外咬了一下耳朵就又返了回来。一进门便冲着马赛他们的桌子走过来。马赛害怕两个伪军直接与首长搭话，因为二位首长都是外地人，他们听到外地口音就会更加怀疑。于是他就赶忙起身迎了上去。“喂！老弟，借个火。”马赛掏出包纸烟抽出一支，把两个伪军拦住了。没容两个伪军说话，他就又故意大声对饭馆的掌柜喊道：“能不能快一点？我们上午还要赶到安阳去，有要紧事要办！”两个伪军一听马赛说要上安阳，其中一个尖脑袋的家伙就皮笑肉不笑地冲着他问道：“你们是到安阳去的？”“是呀！”马赛答道。马赛又接着话茬说：“我们奉命办事，常到你们这里来。”那两个伪军听了马赛的这番话后也就没敢再找什么岔子，说了几句客套话就溜了。两个伪军走后，马赛立即对二位首长耳语道：“看来这里是不能久停了，得赶快离开。”二位首长说：“好，一切听从你安排，一二顿饭不吃不要紧，饿不坏。”首长同意后，马赛喊来饭馆掌柜，说：“为了赶路，我们不吃了，给结算一下茶水费吧。”这家饭馆的掌柜也挺客气，说啥也不肯收。他也仿佛从中意识到了一些什么，就催着他们快走。马赛与首长他们从饭馆中出来，就顺着城墙外的一条路向东走去，到城东南角向南穿过段庄、黄孔村，然后上了去五陵的大路。上路后又走了一程，马赛就让李廷柱返了回去，他护送二位首长继续前行。中午时分，他们到达五陵镇。五陵紧靠卫河，河东就是沙区抗日根据地了。这时马赛的心情才稍微轻松了一些。他想，到现在还没吃上早饭呢，自己饿些不要紧，可别让首长饿坏了身体。于是就赶紧领着二位首长

来到一个比较僻静的饭馆中，随便吃了些饭。饭后稍事休息就去码头上乘船过河。码头就在五陵南门外，当他们走到南寨门口时被两个站岗的伪军拦住了。站岗的伪军盘问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从大队部。”马赛回答。“往哪里去？”“过河。”伪军又问：“那边是八路军的地方，你们到那里去干什么？”马赛往码头上一看，船上已快挤满了人，再耽搁一会儿等下趟船就更麻烦了。他立刻摆出非常生气的样子，用强硬的口气说：“干什么都能告诉你！这是大队长安排的紧急任务，耽误了你可要负责任！”与此同时，二位首长在后边也用劲猛按自行车铃，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情绪。他们这么一硬，站岗的伪军立即就软了下来。连声说：“好，好，你们走，你们走。”他们出了寨门，到达码头，很快上了船，渡过河。上岸后骑上自行车直奔井店镇。下午五点左右，到达了沙区办事处。办事处的王乐亭主任亲自出来迎接。这时，经王主任介绍，马赛才知道自己护送的二位首长，一位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一位是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舒同。

第二天，马赛又带领几名交通员赶回蚕姑咀他家中，来接首长的爱人和警卫人员。为了确保安全，他又对护送工作作了精心安排。让二位女同志装扮成当地财主家的媳妇走亲戚的样子，坐在马车上，车后尾上放的牲口草料筐中藏着枪支和子弹。由老交通员田世忠赶车，马赛的二哥在后边跟车护送，经黄下扣村顺利地通过了铁路封锁线。4个警卫人员也都化了装，装扮成当地农民，分成两班，分别由两个交通员带领，从宜沟三里屯一带过路。就这样，他们都安全地通过了敌占区，到达了沙区办事处。

我所了解的陈曙辉烈士

李靖江

陈曙辉烈士，原名水源，又名曦，1916年农历十月初六日生，滑县新楼村人（新楼村于解放后划归长垣县）。家富裕，父陈学博习儒，诗书教子。曙辉幼年前在瓦屋村滑县县立第八小学上学。

陈曙辉聪慧俊美，其父与我大哥同学，其表姐为我三婶，常在我家（李白社村）居住，为其表姐所宠爱，长我两岁，呼之曰“喜叔”。每饭后即邀我辈同嬉戏，为我诸弟兄中之自然领袖。嬉戏花样多，指挥有条不紊。因我家食口过多，其表姐为防嫌计几次欲遣其回家，均因我辈之挽留而不果。一日晨，三婶不饭而令我大哥遣其离村。饭后，三婶说，他要向我告别，而未获准。哭着上车走了，我快快终日，时久就淡忘了。

1928年秋，陈曙辉考入滑县县立第一小学（校址：欧阳书院）高级班。1929年我也到该校上学时，无意中碰了面。他叫住我，畅叙童年旧事，共同庆幸同学，从此相处甚得。中华民国国庆节（10月10日），学校在县运动场上演话剧（当时称为“文明戏”）。剧情是根据当时的国情编了三个场面：一是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中国人不敢反抗；二是官府压榨老百姓，老百姓忍气吞声；三是无数饥饿群众，哀声遍野。在这出话剧里，曙辉扮演孙中山。孙中山遇到了这三种情况，就从身上掏出三瓶药水：一

瓶是民族主义药水，一瓶是民权主义药水，一瓶是民生主义药水，分别交给受难者一人，把药水洒向自己的同难者身上，因而民众得救，纷纷起来参加革命。曙辉在演出中，台词讲得清晰自然而流畅，态度庄严肃穆而大方，博得了许多同学的羡慕和钦佩。

某日，我俩从校外回来，穿过前院月门走到“秋声楼”前时，他叫我读读墙上挂的木牌上的标语：“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我问他：“‘救国’和‘做大事’怎样讲？”他答：“唤醒民众，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我说：“不做大官怎么能做大事呢？”他说：“能，必须立大志。”显然，这是他从演剧中体会出来的道理。可在当时我对他的回答并不十分理解。及今思之，他在中学时代以及抗日时期的各种革命性活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生的根，发的芽。

1930年，陈曙辉考入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初级中学。1932年，我到开封升学，遇到一中的杨连相同学（解放后任滑县教育局科长，改名杨仲三）。一日，我俩同乘一辆黄包车到中央旅社我的住处。在车上，我问他：“为什么没见到陈水源？”他立刻制止我说：“别提他，他被捕入狱了。”过了几天，我随几个同学到一个同乡家里。这个同乡是开封高中才毕业的，在谈话中，他嘱咐我们说：“开封各校，共产党活动甚烈，遍贴传单，散传单，有时早晨会在床头上发现传单。省府搜捕很严。在街上，不要乱看张贴的传单；在学校，不要乱看杂志刊物。”他举例说：“陈水源在学校常常偷看《新青年》、《向导》之类的刊物而受了影响，文章写得偏激，在反对×教师时而领导罢课，就被捕了。”

陈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才获得释放。乃改“水源”为“曙

辉”，同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安阳河南省立第二高级中学。1935年寒假后，我从开封豫中中学高中部转学到安阳二高后，就探听陈曙辉和原在二高教学的表姐陶××的消息。某日晚自习堂上，我问班主任（化学教师，涉县人），他一听就“啊”了一声，接着说：“不知道，不知道。”1936年暑假，我和一个同学乘火车回家路过汲县，应同学王连洲（王庄人）之弟的邀请在豫北中学住了一天。谈话中，连洲之弟说：“我在北大上学，北平的同学传言说：‘安阳二高，党派复杂，活动甚烈。’真实情况如何？”我说：“我没有感觉到。”他说：“你未到安阳高中之前，学校因闹学潮无法收拾，曾停课放假，师生解散回家。后来学校分别通知复课。有的没有通知，陈曙辉就是这样被开除的。”

1938年秋，我在四川丰都城内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第六期甲级队受训时，一天早晨升旗礼毕，副主任杨文铤宣布：“×、×两位先生有件事向大家宣布。”当即有两个身着长衫的人文质彬彬地登上主席台讲话，大意是：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国共合作，共同抗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班第五期毕业同学陈曙辉，原名陈水源，河南滑县人，毕业后任新生活运动会视察员，在长江招商局轮船上工作，自由舒适。“七七”事变后，他抗日心切，要求跨过黄河到敌占区组织民军，抗击日寇。经康先生（指特训班主任康泽）批准，任命他为别动总队少将参议，并发给他头把手枪20支、手榴弹500枚、电台1部、经费10000元，经费实报实销，以后可以再领。他回乡后，就组织了抗日游击支队，任司令，颇得民心。现在担任着滑县、长垣、浚县三县县长。因人手不足，愿请黄河北岸的同学回乡协助，特别是滑县同学，熟悉地理环境，更为欢迎。愿回乡的可以报名。不论你受训时间长短，均承认你的学籍，根据所任工作给予官衔。

当时在特训班受训的滑县学生只有魏涛（原名阳宗，魏园人）和我两人。魏涛商之于我，意欲报名回乡。我感觉自己刚刚入伍，尚无一点军事知识，即便回去也无助于曙辉，因而作罢。

本来在我心目中，陈曙辉早在中学时代即已参加共产党了。所以听说他是特训班第五期毕业，参加了别动总队，心颇狐疑。

后来，虽有所闻，但不具体。解放后才了解到：曙辉被安阳高中开除后，流落北平。在穷困潦倒之际，曾得共产党员张辑五（瓦岗人）的帮助，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找一生活门路，因此投考了特训班，以求安身。但曾向张辑五保证：“身在曹营心在汉”，初志不变。

果然，1938年在其组军初具规模时，特意去瓦岗找到张辑五汇报情况，谈了他密不可宣的任务，提出了投奔八路军的行动计划。曙辉是一名“言而有信，永不变节”的青年。

陈曙辉舍弃自由自在的视察员工作，情愿迈进艰苦复杂、战火纷飞的敌占区内，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抗击日伪军。在道清（道口——清化）铁路、滑长（滑县——长垣）公路、濮阳、东明一带，扒铁路，袭城镇，扰乱打击日伪军，屡建奇功。曙辉对其在少年时代“唤醒民众起而革命”的雄心壮志实现了。

陈曙辉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表赞颂，一开始就能和八路军部队团结友爱，并肩战斗。1938年冬，舍弃国民党军少将参议的大官职不干，情愿在冀鲁豫第二支队下任大队长；舍弃国民党军的资助，情愿投奔八路军，为争取抗日的胜利而艰苦奋斗，冲锋陷阵，勇敢非凡。这就是他在小学时代深印脑海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所结成的硕果。

原任冀鲁豫抗日第二支队政委刘汉生回忆说：“陈曙辉爱国